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综述及展望

彭 腾 毛 雨 董 琦

(昭通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来自学业、就业、情感等方面的压力导致了各种心理问题的产生。根据心理学界一些学者的研究, 他们把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个原因归结为: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其中, 诸如家庭教育、家庭亲密度、家庭功能等家庭因素被认为是造成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 对当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成为近年心理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大多数研究偏重于理论层面, 且只聚焦于单方面因素对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而忽视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各方面共同的作用研究, 缺乏对改善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实践层面研究。本文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 为下一步具体地在大学生中开展更有实效的生命教育、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进行展望。

关键词: 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 家庭

在哲学上, “生命意义感”, 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心理学界, 维克多·弗兰克尔首先提出“生命意义感”这一概念, 指的是: 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 既每个人在他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拥有需要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命。区别于哲学问题中生命意义之普遍性, 心理学家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 更强调个体的“人”特殊的生命意义。

一、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概述

(一) 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

在过往国内关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中, 对象主要集中在失独人员、医护工作者等特殊人群, 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 关注较少。随着大学生心理问题和大学生轻生事件的频发, 2010年前后, 学界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这一问题。家庭对于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影响巨大, 因此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家庭因素的研究便显得更为重要。李旭、卢勤《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一文通过抽样调查开展研究, 认为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 且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贾林祥、石春的研究从生命意义的视角切入, 认为大学生许多心理问题的产生都源于生命意义的缺失, 因此, 从生命意义的视角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将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 同时也可丰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以上两项研究都说明了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但是不仅是学界, 即便是研究对象本身(大学生)和高校对此这一问题的认识度也比较低。在刘雪珍的研究中, 研究者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与自编生命教育问卷, 对桂西北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桂西北大学生对生命意义有了初步认识, 但总体水平较低; 学生对生命的认知愿望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存在较大差距。这一阶段, 国内对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 主要是站在宏观的视角, 大多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目的在于凸显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二) 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从2014年开始, 国内学界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开始经历“两个转向”, 一是从宏观转向对具体影响大学生生命感因素的研究; 如周静在《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调查与干预研究》中指出: 在性别维度上,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 在不同年级维度上,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 甚至不同专业、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也存在差异。文章试图

去探索造成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具体因素, 但缺乏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二是从问题导向转为原因探究; 在这一研究转向中, 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影响开始被关注。根据篇名、主题、关键词等不同类别, 以“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为检索词, 对知网收录的所有中文文献进行了检索, 整理出了11篇学术期刊论文和3篇硕士学位论文(见表1)。

表1 相关研究的文献类型及发表年份

	2014年	2016年	2017年	2020年	2021年
学术期刊	2		1	1	7
学位论文		1		2	

从上表可以看出, 从2014年开始, 此后的6年间, 对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的研究, 起初速度较缓慢、力度也较小, 研究成果较少。到2021年, 相关研究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 仅2021年发表的相关学术期刊论文数量便等于前几年的总和。

2014年, 李旭、卢勤发表《大学生家庭因素对生命意义感及自杀意向的影响》一文, 认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 家庭是影响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以及自杀意向的重要因素。同年, 李艳、何畏等人在《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幸福感知的相关性》一文中, 通过量表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 母亲情感温暖不仅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 还通过幸福感知、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意味着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家庭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显著影响, 并开始进一步细化研究影响的方式和路径。

基于白艳巧2016年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 魏艺铭、白艳巧于2017年发表题为《大学生家庭亲密度、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的文章, 该文的研究结论与李旭关于大学生家庭因素对于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并且进一步提出自我和谐在实际家庭亲密度、理想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即家庭亲密度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可以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产生直接影响。

2020年, 一共有1篇学术论文及2篇硕士学位论文发表, 相关研究在家庭因素这一大的方向上深入, 聚焦于家庭功能、父母教养方式, 继续探讨家庭与大学生生命感之间的其他中介, 并尝试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来研究家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综合上述相关研究, 截止至2020年, 研究结果整理得出: 母亲情感温暖不仅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 还通过幸福感知、积极应对

方式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自我和谐、心理资本等因素可作为中介在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作用。生命意义感当中的拥有意义感子维度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作用。积极的教养方式通过生命意义感、核心自我评价的并行和链式中介路径对无聊倾向产生影响。

到2021年,共发表7篇相关论文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深入和发展,也从新视角开始了探索。林铮铮、黄琼的研究再次证实了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挖掘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李秀雅、刘利华等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可以通过互惠性孝道间接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刘丽娟发现了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将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孙洪礼探索得出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亲密度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林国耀、周明慧等发现家庭支持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正向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韩引弟、陈红艳发表《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提出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突出表现在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两个维度。从其他视角切入,卢伊颖、薛颖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叙事既直接正向影响生命意义感,又通过自我接纳间接正向影响生命意义感。这表明家庭叙事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使学生相信拥有计划自己将来的能力,从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积极地看待自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二、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特点和展望

经过上文归纳梳理,总结得出: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的研究,在内容方面,主要的特点是集中在对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研究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研究两个方向。在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研究方面,通过回顾李艳、白艳巧、韩思羽、林铮铮等人的研究,整理得出:自我和谐、心理资本、幸福感指数、积极应对方式、互惠性孝道、情绪调节策略等因素可作为中介在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作用;在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研究方面,通过回顾袁雯雯、王和琳、孙洪礼、林国耀等人的研究,整理得出:生命意义感可以作为中介,在家庭与无聊倾向、心理健康、自尊、主观幸福感等因素之间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也有不通过中介,直接对两者关系进行探索的研究,如李旭和韩引弟的研究。还有少量从其他视角切入的研究和探索,如家庭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应局限于家庭亲密度、家庭功能、家庭教养方式等维度,也可以从家庭叙事这一手段来发挥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使用量表和问卷来分析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当前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尚待深入和扩展之处,首先在于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生命意义不但与家庭功能这样的客观因素相关,而且与心理资本、应对方式等个体主观因素相关,从刘轩、瞿晓理的《江苏青少年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分析》一文可以得到启示,个体的主客观因素是如何在家庭功能和生命意义感之间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此外,大多数研究偏重于理论层面,缺乏对改善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实践层面研究。在过往的相关研究中,已有人注意到应对方式是影响很多心理行

为的中介变量。根据现有研究提示,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是预测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内部变量,发展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帮助个体解决问题,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进而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家庭因素如何通过应对方式间接预测、调节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的实践研究对于探索提升生命意义感的途径也能提供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填补了之前的空白,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更加具体。但也存在研究视角不够开阔,研究趋向同质化,缺乏特色和创新的问题。多数研究结束于理论成果的提出,未基于理论成果提出具体可行、有针对性的建议,理论成果与教育实际应用结合度低,应进一步梳理并推广研究成果;学者们专注各自的研究,只顾着向前,未将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因而研究深度提升缓慢,未能从全局上打开局面,论文众多但呈现出后劲不足的趋势;此外研究方法上仍需进一步创新,未来研究应加强生命意义感的实践研究和高质量的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旭,卢勤.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10):1232-1235.
- [2] 贾林祥,石春.从生命意义的视角看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其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09):142-145.
- [3] 周静.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调查与干预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6.
- [4] 李艳,何畏,张贤,郭峰,蔡静,郭巧红.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幸福感指数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11):1683-1685.
- [5] 魏艺铭,白艳巧.大学生家庭亲密度、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7,33(05):113-115.
- [6] 王和琳.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和拥有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0.
- [7] 袁雯雯.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无聊倾向的影响——生命意义感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多重中介作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19(06):24-30.
- [8] 李秀雅,刘利华,方燕红.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孝道信念的中介作用[J].心理研究,2021,14(02):162-168.
- [9] 刘丽娟.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J].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1,36(06):86-90.
- [10] 孙洪礼.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自尊的影响: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J/OL].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5257.R.20211103.1743.005.html>
- [11] 韩引弟,陈红艳.家庭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J].教育观察,2021,10(37):80-83.

作者简介:

彭腾(1994-),女,汉族,湖南衡山人,硕士,助教;
毛雨(1994-),男,汉族,云南昭通人,硕士;
董琦(1992-),女,回族,云南昭通人,硕士,助教。